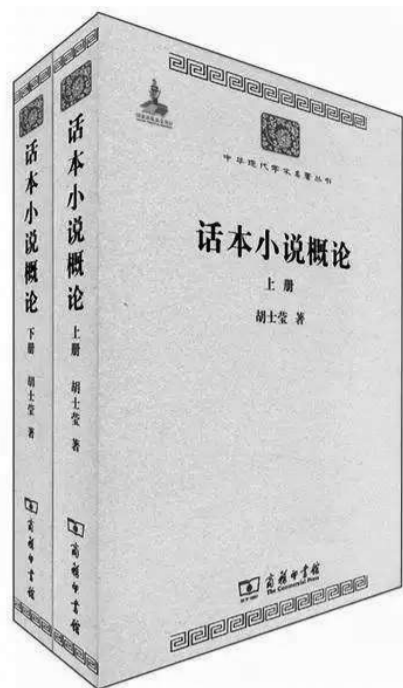


胡士莹先生的学术生涯与《话本小说概论》

■ 宁稼雨



胡士莹(1901-1979),字宛春,当湖人



胡士莹所著的《话本小说概论》

校订完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我的脑海中胡先生的人格形象和学术品格也就如同照片在显影液中起反应一样逐渐清晰起来。

一、关于胡士莹先生的生活时代和学术背景

生于1901年的胡先生可谓与世纪同生。他经历了晚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四届政府，亲眼见证了由封建王朝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变。这个时期正值中国社会转型，各种内忧外患齐聚，国人饱受各种伤痛。这样的生存背景，注定了深受传统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影响的胡士莹和大多数文人一样，尽管没有投笔从戎，战死疆场，但心中却放不下那满目疮痍的祖国。抗战爆发后，正是胡士莹先生在上海任教时期。他以一个普通文人的身份，加入以吟诵爱国抗战为主调的文人诗社“午社”。1941年还应邀参加了夏承焘先生在上海发起的“龚定庵逝世百年祭”活动，畅抒爱国衷情。次年，他在写给夏承焘先生的词中道——

……暮日江山恢复热，故国鹃声切，悲茄正咽。无穷心事，剩有诗肠社陵热。

表达出与杜甫一样的爱国热情，并且还独生子送到新四军，鼓励其奋勇杀敌，光复祖国。这样的经历和背景既是他人格的写照，也是他后来从事文学研究，解读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比较关注现实的社会基础。

自明清以来，江浙地带一直就是中国文化的繁荣地区，可谓人杰地灵，名家辈出，硕果累累。胡士莹先生毕生生活、工作在这个环境里，受到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影响，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据说他十岁之前就能把《四书》倒背如流，并且工于诗词，十五岁所写诗词已经享誉乡里前辈。后来无论是在家乡中学教书，还是在上海大学任职，都经常和同僚朋友往来唱和，吟诗诵词，多有佳作。1930年，他曾将所填词佳作结集为《霜红词》在扬州出版，得到吴梅、浦江清、陈运彰等名家的盛赞。吴梅先生称他以其“婉和韶令之韵”的独具风格，抒写自己的“华年哀乐”，卓然成家。浦江清在长诗《寄题胡宛春霜红词》中，称赞说——

蕙风(近代著名词人况周颐号)云：段疆村(著名词人朱孝臧号)老，天下音声付年少。浙中并起有三人：宛春、徐(声越)、陆(微昭)皆驰妙。

而《霜红词》更是“风雅不随甲马废，通介竟与俗人殊”。词学家陈运彰后来也说——

胡君宛春尝哀其三十岁以前之作为《霜红词》，盖殆乎能自树立者矣！

不仅如此，胡先生还写得一手好字。他曾遍临汉唐名家碑帖，又能自成一派，风格自立。胡先生的书法曾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展出，其小楷字帖《鲁迅诗选》(内分甲、乙、体)也曾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甚得书法界的好评。香港《书谱》曾载文称——

胡老工书法，生平临《兰亭序》数百通……其临冯承素兰亭，尤为神似，所见无出其右。

他的好友，复旦大学徐震堉教授在《宛春杂著》序中特别指出——

他晚年在杭州大学任教，主要讲话本小说这一门课，大家只知道他是这一方面的专家，除了少数几个老朋友外，很少人知道他在诗词书法方面的造诣，在当代名流中，是屈指可数的。

另一方面，自近代，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不断传入中国，而上海一直就是接受外来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前沿和窗口。被称为“海派”的上海文化和学术明显具有以开放姿态吸收外来文化和学术思想的特质。处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和背景中，胡士莹先生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国学功底，又能接受新思想和新方法，形成20世纪中国学人特有的学术品格。

二、关于《话本小说概论》的学术价值

丹纳认为地理环境是影响和造就一个文学团体乃至一个文学时代的重要因素。我认为这个论断也适用于学术研究。江浙一带不仅是自明清以来白话通俗小说的集中繁荣地，而且也是近代以来明清小说、戏曲研究名家辈出的地区。王国维、鲁迅、赵景深、叶德均、王古鲁、马廉、谭正璧、浦江清、任二北……都是江浙一带人。这些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故乡文化氛围的影响，把研究体现故乡文化特色的小说戏曲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工作和事业。而胡士莹先生也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他在话本小说研究领域作出的成就是继鲁迅之后把该领域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学术制高点，不仅惠及后人，而且至今也无人出其右者。

和传统的几种高雅文学样式(诗词散文等)相比，古代小说戏曲不但其文种的形成、繁荣大滞后，而且相应的学术研究也无法和诗文研究相比。现代意义上的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大约是从王国维和鲁迅开始算起。《中国小说史略》和《宋元戏曲考》结束了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以非系统的散点关注为特征的早期研究，进入

到以系统和逻辑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研究视角阶段。他们不仅为古代小说戏曲研究规划了系统蓝图，而且还提供了具体的操作范式。如同一个知名品牌有了品牌的设计理念和产品规格后，就可以进入批量生产的阶段了，而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就是这些产品中的优质品。

《话本小说概论》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第一次为作为中国古代小说重要组成部分的话本小说勾画了完整而详尽的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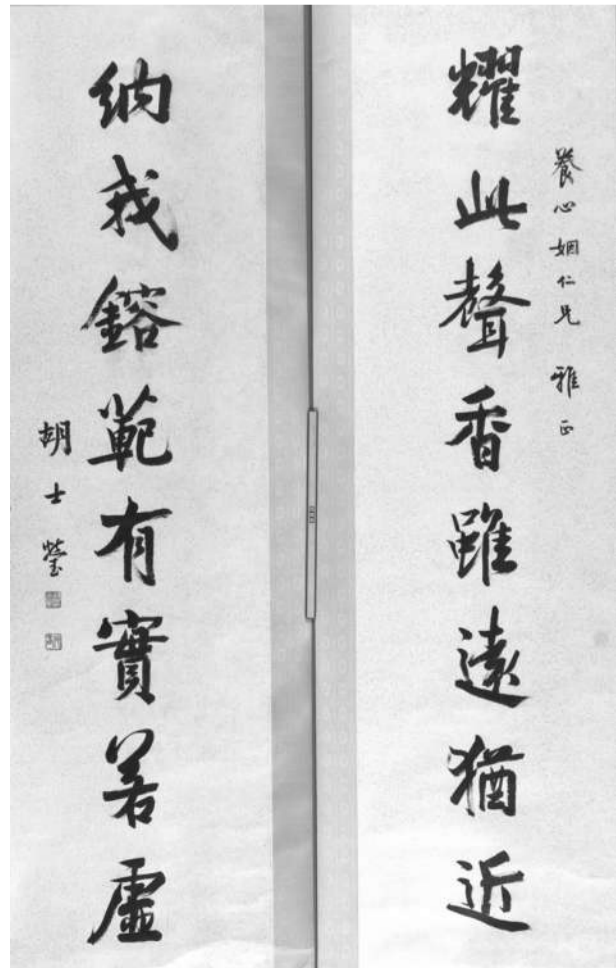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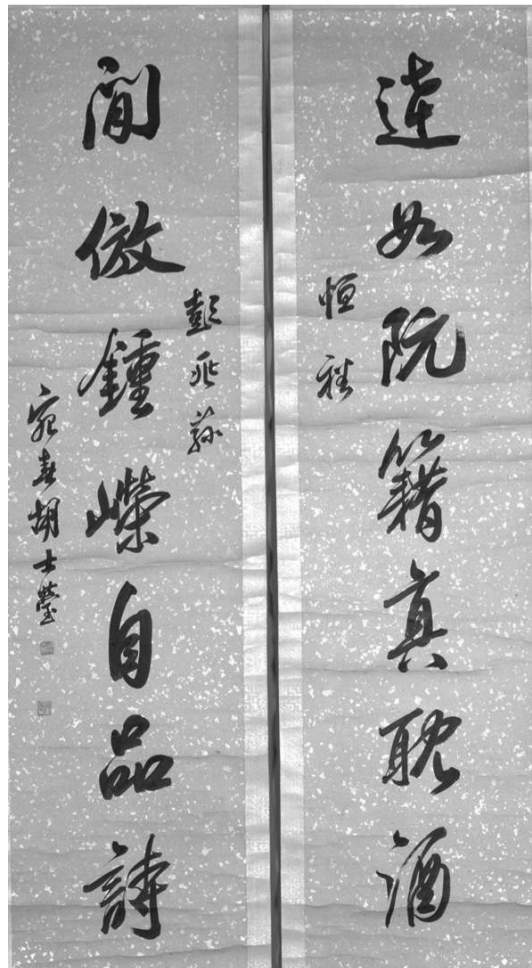
从20世纪开始，中国小说开始受到学者们的瞩目，出现一批筚路蓝缕的拓荒之作。他们从不同角度构建营造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基本框架。但既然是拓荒，必然耕作未必细致，留给后人深耕细作的余地。就话本小说而言，在胡士莹先生之前或同时，学界已经有过一定的学术积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总共28篇，其中第12篇《宋之话本》、第13篇《宋元之拟话本》、第21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3篇均为话本内容，为话本小说勾勒了基本的轮廓框架。孙楷第的有关话本小说的目录学成果、话本小说产生演变源流和作品考证，也是相关重要成果。谭正璧《二言两拍资料》则将“三言二拍”几乎全部作品的本事源流做了全面的挖掘和梳理，是话本小说本事的重大突破。此外，赵景深、叶德均有关话本的体制和起源等方面均有重要建树。这些相关背景、团体组织、表现方法诸问题，都试图用历史唯物论进行分析。关于说话人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以及对于当时的影响，还有话本的分析方面也试图根据辩证唯物论，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这样的提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左”的味道，让人不敢恭维。网上也出现过质疑《话本小说概论》这方面问题的网站。对此我以为，倒是应该用历史的态度看待此事。理由如下——

其一，任何人都很难跳出自己的社会生存环境来思考和对问题，社会科学研究尤其如此。从赵景深先生序言中可以看出，该书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已完成初稿，后来几易其稿的内容，主要精力是放在思想和艺术评价等理论方面的探索 and 追寻。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会有那样的体会，尽管有人想以政治上的所谓进步来进行政治投机，但就多数而言，那种探索和追寻不是政治上的赶时髦，更不是政治投机，主要还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学术的负责。这一点，尤其值得“文革”后出生的朋友们给予设身处地的理解。我个人以为胡士莹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

其二，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话本小说研究未尝不是一种有效和可行的学术研究方法。但把唯物辩证法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正确方法则是荒谬的，可反过来说，凡是染指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便是大逆不道，也未必在理。话本小说是市民文学，它不仅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也传达市民阶层的观念和好感。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解读分析话本小说不失为一条重要与可行的研究渠道。从该书内容看，有很多地方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来分析社会生活与话本小说起源发展及反映内容的关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正如赵景深先生序言中所言——

著者认真分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斗争，对于上层建筑之文艺的影响，对于说话和话本的影响，分析了人民群众在说话艺术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从而作



胡士莹书法作品三幅

我们学习的。

赵景深先生称此书为“内容丰富的、总结性的著作”，按我个人理解，就是指该书能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集其大成，自成体系。这应该是该书的重大学术贡献，同时也是对小说类型史写作的开创性尝试。

其次，新旧治学方法的有益尝试。从经历和学术背景上看，胡士莹先生可谓以旧学根底为主，同时也受到20世纪以来新学的影响。这成为他个人学术风格的主要特色，并且在《话本小说概论》一书中得到有益和充分的尝试。

《话本小说概论》一书的成功，主要得力于胡士莹先生过硬的旧学功底。他认为做学问要从基础工作做起：“我以为真正做研究工作，必须首先研究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在话本小说有关材料搜集和占有，到各种相关材料的辨伪、钩沉、辑佚等，该书可谓达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其中有很多当时学界普遍没有看到的珍贵材料，该书第一次向世人披露。如根据明刊本宋懋澄《九籀集》提供的《负情侬传》信息，根据明代万历本《小说传奇》提供的《李亚仙记》材料，根据明何大抡的《燕居笔记》提供的《杜丽娘慕色还魂》原文等，都是当时非常罕见的材料。其他如前人所未见未闻的拟话本集如《跨天虹》、《美人书》、《别有香》、《路春台》、《壶中天》等若干种，著录各种话本、拟话本集达六七十种之多，并辑佚《王魁》、《钱塘梦》、《裴秀娘夜游西湖记》、《张于湖宿女贞观》等宋元明话本、拟话本若干种，为国内外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上世纪80年代以后问世的各与话本小说有关的目录学工具书，水平质量参差不齐。而是否参考使用了《话本小说概论》，以及参考使用程度如何，直接影响和制约了他们的工作成效和质量。这足以说明该书在话本小说文献材料方面的学术价值。

江浙地区的生长环境，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的新学教育和上海工作的经历，使胡士莹先生形成了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学术理念。这一理念与建国后意识形态环境大背景相汇合，也就成为胡先生在书中对于话本小说发展过程中各种理论问题和规律问题探索的勇气和动力所在。作为一位受过传统治学训练和熏陶的旧知识分子，他和建国后大部分文学史的撰写背景相同，在几乎没有话本可以仿照的情况下，既要符合当时大的社会环境的要求，又要认真体现出文学史的真实面貌，这是难度很大的工作。赵景深先生序言中提到该书“是精心结撰的、论断比较恰当的”，主要就是指该书能“将话本小说的起源、演变、社会背景、团体组织、表现方法诸问题，都试图用历史唯物论进行分析。关于说话人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以及对于当时的影响，还有话本的分析方面也试图根据辩证唯物论，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这样的提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左”的味道，让人不敢恭维。网上也出现过质疑《话本小说概论》这方面问题的网站。对此我以为，倒是应该用历史的态度看待此事。理由如下——

其一，任何人都很难跳出自己的社会生存环境来思考和对问题，社会科学研究尤其如此。从赵景深先生序言中可以看出，该书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已完成初稿，后来几易其稿的内容，主要精力是放在思想和艺术评价等理论方面的探索 and 追寻。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会有那样的体会，尽管有人想以政治上的所谓进步来进行政治投机，但就多数而言，那种探索和追寻不是政治上的赶时髦，更不是政治投机，主要还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学术的负责。这一点，尤其值得“文革”后出生的朋友们给予设身处地的理解。我个人以为胡士莹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

其二，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话本小说研究未尝不是一种有效和可行的学术研究方法。但把唯物辩证法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正确方法则是荒谬的，可反过来说，凡是染指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便是大逆不道，也未必在理。话本小说是市民文学，它不仅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也传达市民阶层的观念和好感。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解读分析话本小说不失为一条重要与可行的研究渠道。从该书内容看，有很多地方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来分析社会生活与话本小说起源发展及反映内容的关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正如赵景深先生序言中所言——

著者认真分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斗争，对于上层建筑之文艺的影响，对于说话和话本的影响，分析了人民群众在说话艺术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从而作

出比较正确的论断。对唐代坊制的论述，也为宋代市民文艺的所以繁荣提出了新的论据。对明代后期风起云涌的市民斗争说书及话本小说的关系，更有所发挥。

如果过滤掉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用语，我们不难把握作者在其中为努力探索社会生活与话本小说发展的内在关联而付出的良苦用心、艰苦努力和收到的良好效果。

其三，从胡士莹先生本人的学术立场来看，虽然他愿意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但并不出于赶时髦，也不能证明他就是个极左思潮的痴迷者。他本人即便是在“文革”前，也能坚持真理，不跟风投机。早在1958年，针对社会上那种“作者的阶级出身即等于作品的阶级性”的简单化倾向，胡先生发表过《关于阶级观点的问题》一文，明确反对这种错误观点。他的这些意见在当时所谓“拔白旗”的运动中，曾经被扣上“否定作品的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的帽子而遭到批判。“文革”初期，全国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热潮甚嚣尘上，但胡士莹先生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些都表明，他既不是一个以学术作为政治投机手段的人，也不是一个顽固坚持左倾思想的人。即便他的著作中有些过时的观点，也应该理解为他本人对真理的认识(即便是有局限的认识)，而不能扣上极左的帽子。

三、关于本书的局限和话本小说研究的前景

不能否认，由于历史和作者本人的缘故，《话本小说概论》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了解和认识这些不足，看到话本小说研究的前景，对学术事业是需要的，对作者和读者也是负责的。

首先，尽管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来研究文学现象是可行和必须的，但仍然还是有角度的把握问题。超过一定限度就容易走偏，影响对文学现象的公正客观评价。作者在使用历史唯物论作为价值坐标来评价话本小说发展历史的文学现象时，有时过于强调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甚至以此作为评价作者文学成就高下的准绳，这就难免失之偏颇，难以服人。这集中表现在作者书中对凌濛初及其“二拍”的评价上。据赵景深先生序言，在作者最后一次修改稿中，“已把过去对凌濛初的评价偏高的地方做了修改”，理由是要“更进一步地从阶级观点来看问题的”，因为“凌曾经抗拒过农民起义军”。所以“冯梦龙的《三言》他用三节篇幅来论述，《二拍》只用一节，而且还和《石点头》等合在一起”。这样的处理显然不够妥当。从后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反映明代社会新思潮和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形象描写方面，“二拍”有很多独特的价值和贡献，是可以和“三言”并为拟话本小说“双璧”的。这一点是今天的读者需要注意，并且在话本小说的社会学研究方面再下功夫。

其次，文学研究，尤其是作为叙事文学特殊样式的话本小说，光有以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研究是不够的，还需要适合话本小说文体的多方位的研究角度。比如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话本小说的内容与理学、心学乃至朴学的关联；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话本小说有着非常鲜明独特的叙事学表现特征，科学总结研究话本小说的叙事学规律和特征对话本小说研究极为重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无法苛求胡士莹先生做到这一切。但今天的话本小说研究无疑需要补上所有学术的空缺。同时，我们应该对《话本小说概论》为话本小说的深入研究所做的奠基和先期工作，表示由衷的敬意！

第三，关于话本小说研究相关材料的搜集。不难想见，包括胡士莹先生在内的前辈学者当时的研究完全依靠人工抄卡片和人脑记忆的方式。这种在艰苦工作条件下极为坚韧的工作态度是值得今天的学者们认真学习的。尽管今天在古代文献电子化的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人们的检索和搜集材料手段和渠道与前辈学者相比也已经有了巨大进步，但对这些先进的现代化手段我们一方面要充分熟悉和使用，另一方面，又不能过分依赖电子文献。电脑是人做出来的，它再怎么先进，也要滞后于人脑，也无法取代人的大脑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像胡士莹先生这样的老前辈学者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治学态度和获取一手材料的方法途径，今天的青年学者不但不应该摒弃，相反应该认真学习和使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前辈开创的学术领域继续探索，继往开来。

(注：本文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此文是作者为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胡士莹先生《话本小说概论》一书所作校订前言)